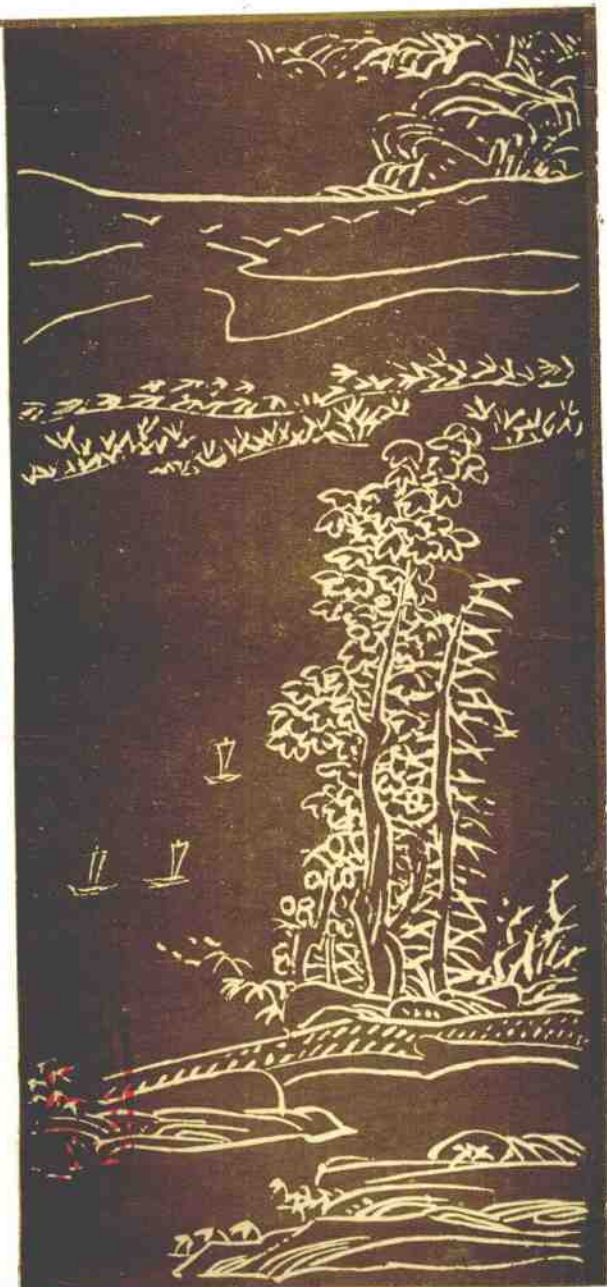


邗江文史資料



邗江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邗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五年十月

目 录

语言文字学家于在春传略·····	冯菊年 (1)
于在春年表·····	冯菊年 (30)
敢吃眼前亏·····	金性尧 (50)
《于在春语文教学论著选》前言·····	芮和师 (53)
偶遂堂诗剩序·····	胡邦彦 (63)
哭长兄在春 (二首)·····	于弼庭 (64)
缅怀于在春同志·····	李仲南 (64)
挽于在春·····	胡邦彦 (64)
挽于在春教授 (二首)·····	汤 杰 (65)
银行家胡笔江史料选编·····	(66)
胡笔江墓志铭·····	金天翮 (66)
《胡笔江墓志铭》书后·····	祁龙威 (69)
蒋介石致徐胡家属唁电·····	(70)
朱家骅致胡徐两家属唁电·····	(70)
中南银行总管理处致胡笔江长子胡惠春唁电·····	(70)
蒋介石致政院请从优褒恤徐胡电文·····	(71)
政院会议决议，呈请国府分别褒扬徐胡，各给抚恤金 一万元·····	(71)
宋子文在“徐胡二公追悼会”上报告 (节录)·····	(72)
汉市各界追悼徐新六胡笔江·····	(74)
挽联选录·····	(76)

胡笔江先生小传·····	《上海名人传》(77)
胡笔江事略·····	《申报》(78)
中南银行常务董事徐静仁在第十八届股东常会上致 词·····	(80)
胡笔江在中南银行第十五届股东常会上的报告·····	(81)
胡笔江致中南银行董事会函·····	(82)
和于树滋《重游壁水述怀》·····	胡笔江(83)
著名农业机械专家余友泰·····	张再生(84)
陈含光诗忆倪在田·····	汤杰(91)
石极宸其人其事·····	高惠年(93)
邗江县建县、撤并和恢复经过·····	陈慕(96)
回忆《邗江报》·····	王澄(100)
济善洲迁垦事略·····	丁桂芳 张福凯(104)
邗江县第一片服装厂·····	汤杰(106)
太安四坊、五匠的兴衰·····	高正中(109)
太安的鱼网、粉瓢、水车和九人轴·····	高正中(112)
扬霍公路的一场风潮·····	吴家宝(115)
解放前的公道镇粮食集市·····	陈其高 倪永俊(117)
瓜洲邮电局与国共通邮·····	高惠年(119)
战时通邮交换点——刁家庙·····	陈慕(121)
解放初期的高旻寺·····	张福凯(123)
高鹤年与来果·····	闻史(127)
来果和尚致高鹤年居士书札·····	顾一平(129)
甘泉人民抗美援朝参军纪实·····	赵瑞智(134)
解放初期的杨庙镇工会·····	赵瑞智(140)

瓜洲学校百年史略·····	高惠年	(145)
抗战初期的瓜洲小学及其教唱的革命歌曲·····	张君宏	(159)
阮元所遗端溪巨砚·····	徐心然 吴 炜	(163)
清北湖耆旧祠简介·····	阚牧谋	(167)
瓜洲于氏胜迹简介·····	张君宏	(170)
扬剧前辈盖砚秋·····	薛艺友	(172)
杭集花鼓戏世家·····	韩戏之	(173)
陆怀仁献技夺魁·····	韩戏之	(174)
杭集东狱庙的万年台·····	韩戏之	(175)
扬剧奠基人之一潘喜云·····	刘一飞 陆声洪	(176)
江北梅兰芳——张月娥·····	刘一飞 陆声洪	(184)
扬剧生角全才筱奎童·····	刘一飞 陆声洪	(187)
池雨扬诗选·····		(192)

语言文字学家于在春传略

冯菊年

于在春（1909—1993），曾用名于禹孙，又名再春，字熙台，笔名载琮、高则明、于是、过江鲫、宋聚珍、太一、青初等，江苏邗江县瓜洲镇人。为当代语文教育家、古文普通话翻译家、优秀的编辑工作者。他以毕生精力积极宣传推广语文教学改革和文言文普通话翻译的口语化、规范化，为祖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生平有关教学经验、语言文字及古文翻译的研究论著和古文翻译作品相当丰富，约有五百万言。

一、家庭的熏陶

在春先生于1909年3月30日（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九）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城内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汉族大家庭中。曾祖父于养源（1831—1859），字小堂，自幼聪颖，诗才隽雅，曾宦游江苏盱眙，著有《都梁草》诗集。祖父于树滋（1856—1938），字德甫，号遁叟，别号东轩老人，以字行，清季秀才，经营工商，为当地著名士绅。中年以后，因病谢绝外事，闭门读书吟咏，著有《重游泮水唱和集》、《瓜洲伊娄河棹歌》、《瓜洲续志》，为瓜洲文献的搜集刊行，出力颇勤。他为人严正，办事勤恳，深得亲族友朋敬重。

父于炳勋（1886—1942），字少甫，曾就读于江阴南菁

学堂和法政学堂，毕业后考取县知事，曾两度短期出任北伐前江西宜黄县县长和抗战前江苏沛县县长，候补期间曾任科员及上海法政大学教员。他虽为长子，因长年宦游四方，大家庭的事务由二叔于幼甫、三叔于稚甫经管。原来资产颇厚，但1934年因生意经营不善而大多倒闭，家道开始中落。于在春在这书香门第中，从小受到了熏陶，尤其是他祖父，对其非常爱护。在他四、五岁时，每晚教其背诵唐诗，延续多年，直至十余岁，从不中辍。于在春回忆云：祖父的教育，为我后来从事国文教学和研究影响颇大。

二、家塾与大学

在春先生六岁开始入家塾读书，从人、手、足、刀、尺到《四书》、《五经》，每晚祖父仍亲自指导学习唐诗。课余还涉猎其他新旧书籍，如《龙文鞭影》、《儿童世界》、《小朋友》以及《三国演义》等小说。在家塾时，还专门请了英语教师学习英文，目的为以后能考取教会学校打下基础。

十五岁，进江苏省立第九师范附小七年级插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他关在深宅大院内的家塾中，对外界很少接触。考入学校后才从课本中知道了新文学和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的名字。读了他们的文章，颇感新鲜，因而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新文学作品，扩大了视野，激发起强烈的求知欲。

1924年，在春先生考入上海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附中。他对读圣经、布道、做礼拜毫无兴趣，但对大学图书馆里的古典文学名著，如《水浒》、《红楼》、《元曲选》等，却爱不释手，不分白天黑夜的作为文学必修课来阅读。第二年，上海发生“五卅运动”，他们学校的中学生也集会抗议帝国主

义的暴行。在春先生虽然未直接参加运动，但对圣约翰大学美国人校长蛮横无理干涉阻止学生的爱国行动，感到非常愤怒，遂和同学们一起集体退学，以示抗议。他们一起又转入光华大学附中就读，并直升大学，直至1932年毕业。

在春先生在光华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他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认为政治系功课容易，自己爱好的是文学。但光华大学的国文系课程太陈腐，又缺乏如鲁迅、李大钊一类新文学教授，故不值得报考，仅选国文系为辅系。他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时，深感大学没有读好，故以较大的功夫去自修语法修辞等学科。

三、读书与创作

在春先生是位非常勤奋好学的人。他一踏进中学就如久旱遇到了甘霖。除了上好基础课外，就一头扎入学校图书馆里，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古人的文集、总集无不涉览。同时，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思想影响，在中学时期不仅大量阅读新文艺作品，还开始练习创作小说，十八岁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冷落》。从此，一发不可收，在三、四年间，陆续发表了多篇小说。至1930年，集成《翠环》短篇小说集，由著名作家曾孟朴主持的上海真美善书局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集。

他又以其在家塾及圣约翰大学里打下的英语基础，一面读书，一面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的青少年朋友阅读。他先后于上海正午书店出版了翻译小说《灵与肉的冲突》，和同学合译了童话小说《狗的自传》，由开明书店出版。他还创作了童话小说《鲤的奇遇》，由商务印书馆收购了此书的版权，可惜书稿尚未出版，1931年发生了“1·28”事

变，使这部书稿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化为灰烬。这就是他学生时代边读书边创作的业余创作生涯。

四、投身于教学

1932年夏，在春先生于光华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长期从事国文教师的历程。为了当好一名称职的中学国文教员，他全身心投入进去，对国文文法、修辞进行了刻苦的自修和研究，立志要在国文教学中创出一条新路。

刚跨出校门，由当时任镇江商会会长的叔祖于小川介绍至镇江私立东南职业中学任国文教员。一年后，经表叔法度（后为江苏省文史馆员）介绍至江苏省立淮阴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这是一所正规学校，老师和学生读书的风气都很好。他每周仅十二节课，兼一个班的导师，又是住校，有较多的业余时间。于是他首先自修补习较生疏的语法修辞方面的业务知识。他对国民教育中的老一套，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不满，颇有初生之犊敢于闯的精神，想在努力自修的同时，探索一条新的路子。又深感必须得到有教学经验的同事的帮助才能成功，俗谚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他终于在淮阴师范中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顾民元，于是他们经常切磋商量学问。

当时，淮阴师范的教职员分成新旧两派。旧时新校长上任如县太爷上任一样，往往要带上自己的一套班底。在春先生与新校长并不熟悉，是经亲友介绍后随着校长去就职的，虽是新派，其实是新旧两派均不熟悉；而原来学校的教师对新人马似有个界限，互相总感到每时每刻得有所提防似的。在日常接触中，唯独旧班子中的顾民元，却一见如故，两人十分谈得来，遂引为知己。顾民元（1913—1942）是南通地

区有名的才子李俊民之表弟。他学有专长，知识渊博，是位中共地下党员，思想敏锐而热情诚恳。他们间交谈的主要是业务，在春先生对他是既信任又佩服，但这位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生，却对政治非常冷漠。顾民元也摸到他是位为人正直，对业务专心好学，是非分明，不谈政治的书呆子，所以两人成了好友，只是与他商讨业务，未从政治上有所提携。后来，他们曾讨论准备合编一套《文学鉴赏丛刊》。可惜1934年暑期，新校长带领原班人马调任江苏省立太仓师范学校校长，在春先生也只得与顾民元依依惜别，但两人的友谊是永存的。顾民元是在春先生以后数十年事业上影响很深的一位关键人物。他后来与江上青、李俊民、吴天石、江树峰等合办《写作与阅读》，及从事近四十年的出版工作以至被日寇逮捕，都是与顾民元的影响分不开的。

五、《写作与阅读》

在太仓师范执教的在春先生，边教学边进修，还选编了两册《历代作品选》。这是按照他自己的治学标准选编的，也是他选编古典文学的最初尝试，故他特别引以自慰。第二年春天，在春先生因胃病辞去太仓师范教职，返镇江养病。病情稍好转，又至省立常州中学执教。未几，胃病复发，只得请假，于1935年10月间回家养病并到上海就医。在养病期间，他念念不忘教学业务，并酝酿出版一本宣传新的教学主张和辅导国文教学的月刊，定名为《写作与阅读》，起草了月刊的编辑起缘。他首先把编辑计划、起缘寄给淮阴师范的顾民元征求意见，并邀请他合作办刊。顾民元阅后，大为赞赏，欣然同意合作。顾民元认为一个刊物二个人是不够的，于是向在春先生推荐了他的好友、扬州平民中学教师、中共地下党

员江上青参加。江上青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并又介绍了好友王石城加盟办刊。就这样，由于在春、顾民元、江上青、王石城四人组成《写作与阅读》编委会。为《写作与阅读》积极撰稿的除编委本身外，有顾民元的表兄、苏北七才子之一的李俊民，他曾在大革命时代协助董必武办《楚光日报》，任中共湖北省委青年刊物《湖北青年》编辑。此外，吴天石、马一行等人也成了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或顾问。就这样，《写作与阅读》于1936年11月出版了创刊号。

《写作与阅读》创刊号的出版，使在春先生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了。名义上虽有四人组成编委会，但编委会成员各居一方，从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具体编辑、发稿及校对，实际上都是在春先生一人在镇江张罗。江上青想得很周到，请了他在镇江的胞弟江树峰（时为镇江《苏报》特约记者，建国后曾为扬州市政协副主席）去协助做校对、收发信件等具体工作。刊物虽已出版，但刊物的登记证还未办妥，江树峰当时正好住在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周绍成家里，就通过周的关系，为《写作与阅读》取得了国民党中宣部和内政部的刊物登记证。从第一卷第六期开始为有证刊物，故前六期是他们自找门路印刷，由上海杂志公司总经售；第二卷第一期因有江上青的接洽，改由上海新知书店发行。

1937年春，在春先生在南通执教，正好顾民元在南通养病。于是，《写作与阅读》从第二卷第一期开始，编辑中心移到了南通，编委会扩充了刚从山东归来的李俊民、吴天石（建国后为江苏省教育厅长）、江树峰和施与等八人，主编仍是标榜“技术第一”、没有政治色彩的在春先生，而编委大部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写作与阅读》前几期在春先生把自己对国文教学的体会心得，经验总结及国文教学的改革

主张，毫无保留地作了充分宣传和介绍，显得专业性较强。从第二卷开始，《写作与阅读》的内容和面貌则有了较大的提高和改观，版面也活泼生动得多，可惜仅出版至第四期，日军侵占上海的“8·13”事变发生。这时，《写作与阅读》的编委们都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战场上去，刊物只得宣告结束。

在春先生是位有理论、有实践、有建树、有成果的语文教育专家。他在报刊杂志和自办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独特见解的语文教学经验总结和研究心得文章，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在当时反动当局严格控制社会舆论的情况下，《写作与阅读》以讨论交流教学经验，指导学生学习的的方式，来评论抵制反动教育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的。

在春先生有不少学生后来参加了革命，在他们的回忆中都提到受他的影响，如姚溱（前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闻鸿祥（解放军某部医院政委）。前几年，著名作家袁鹰同志还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怀念和寻找于在春老师。1989年夏，顾民元烈士的纪念集《天光常照浪之花》一书出版，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题诗云：“春翁讲述曾亲近，俊老诗篇我读之。今日元公遗著印，缅怀《写读》出刊时”。其中“春翁”即于在春先生，“俊老”为李俊民同志，“元公”是顾民元烈士，《写读》指《写作与阅读》。以上三位和江上青、江树峰两位都是当年同心协力创办《写作与阅读》的前辈，这也足以说明在春先生在教学的课堂上和主编《写作与阅读》中给当时的教育事业和指导青年学习，有其值得称颂的历史功绩。

六、在上海孤岛期间

抗日的烽火从华北到上海在遍地燃烧，共产党人江上青等立即投入战斗。顾民元在南通办起抗日学校，李俊民于南通家乡振臂高呼，团结有识之士和组织热血青年进行抗日，在春先生家中的弟妹们也都行动起来。大妹于晶（原名在兰）从汉口辗转到了延安抗大，两个弟弟到了大后方重庆。在春先生一则身体时常发病，自己又有六口之家靠他生活；再则老父病重，弟妹远走，父亲嘱其“不要再走”，只得留下。1938年春夏间，他拖着一家老小来到孤岛上海进了租界，在外地迁沪的学校执教养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他有几次奔赴抗日根据地的机会：顾民元在启东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时请他去，李俊民在苏中根据地邀他去，其大妹于晶由延安到了皖南根据地，来信动员他去，都由于家庭拖累和他“安土重迁”的思想，未能实现。

在春先生血是热的，人是正直的。当他了解到根据地缺少救死扶伤的医药时，曾冒着生命危险为其大妹于晶多次提供小批量急救药品。在无数进步热血青年出生入死抗日救国的同时，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营垒中刮起了一股投降风，当时谚称：“降官如潮，降将如毛”，无耻败类纷纷仿效。在春先生的同学刘某，同事钱某都以金钱地位来引诱拉他下水，可他宁愿饿死，决不当汉奸，拒绝了他们的官禄诱惑，却接受了薪金微薄的扬州中学旅沪学校的国文教员和格致学社（光华大学的地下组织）及华东大学（之江大学沪校的地下组织）的国文教授的聘书，以此苦度光阴，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初期，他应邀出席了由陈望道、郑振铎、赵景深等二十余人参加的中国语文教育学会。在语文研究集会中，还

结识了夏丏尊、胡朴安等语言专家，互相交流，切磋学术，颇有补益。在沦陷时，他为逃避日伪而钻入业务之中，先后撰写有《试论中文字架问题》、《字形手册》、《修辞现象论》等手稿，有的发表在上海《艺文月刊》、《国文月刊》、《读书通讯》；有的留在案头不断研究、反复修改；有的至解放初期改写成《论汉字的简化》一书，其观点与后来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张基本接近。

七、在日寇狱中

1944年秋天，某日深夜，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在春先生家里突然冲进一群凶神恶煞似的日本宪兵，指名逮捕于在春，家人惊魂未定，这个身体瘦弱的书生已被虎狼般的日寇绑架而去。同时被逮的还有二人，一是朱秀因（顾民元遗孀，时为今上海静安区常德路小学教师），一是江树峰（由于在春介绍在上海迈尔西爱路勤业中学执教）。当夜三人一起被关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第二天清晨，又被押上开往南通的轮船，再押到海门宪兵队。

后来才知道这是由顾怡生老先生（顾民元之父，南通师范的教导主任，当地著名教育家）给孙女顾乃粒及儿媳朱秀因的信引起的。此信由海门县海复镇寄出，当时日伪正在“扫荡”，他们在邮站截获了此信，信中还夹有给在春先生和江树峰同志的信，三人正好是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日伪怀疑他们三人为地下抗日分子，为三级学校地下联系人，故连夜赴沪将三人逮捕。其中重点嫌疑是江树峰，因而受尽酷刑。至于朱秀因和在春先生只是备查对象，故前二个月对朱、于仅是一般审问，未受大刑。狡猾的日寇曾将朱、于两人关在一起，以便窃听消息。他们当时已识破日寇伎俩

而以沉默不语对待。后来，日本宪兵队副队长亲自审问在春先生，将其双手捆住吊打，刑讯逼供。在春先生是个耿直之人，他咬紧牙关，决不在日寇面前胡言乱语，诬陷他人。朱秀因也被多次审讯，曾用狼狗咬，以及活埋、枪毙来威吓，硬的不行，还以伪县中心小学校长的职务来利诱。几经折磨，结果日寇什么也拷问不出。此时，顾怡生老先生及朱秀因父亲等在外到处奔走托人营救，化去三四十石米钱，才把他们保释出狱。

在春先生在狱中关了三个多月，他与朱保释后十余天，江树峰也释放了。在春先生刚出狱，身体十分虚弱，在南通亲友家调养月余，然后回到上海医疗，才慢慢得以恢复。但他的左臂受伤较重，直至解放后，每逢天阴雨湿，还时有酸痛。当在春先生刚从南通返回上海，日本翻译后脚即已跟到上海，多次上门威胁敲诈勒索，限定日期要他把钱款送到指定地点和某人手中。本来拖着疲惫伤病身躯的在春先生面对一家生活艰难的老小，正在愁得一筹莫展，又遇到日伪走狗勒索钱财，真是雪上加霜。为了免祸，只得典卖家中值钱的东西和借贷来应付。

八、希望成泡影

自在春先生写论文，办杂志，在文坛上初露头角之后，渐渐被人目为新派人物，甚至称其为左倾分子。他自己并不如此认为。但他同情革命，交了不少革命的朋友。他不受败类的引诱，不屈于日寇的淫威，安贫乐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魑魅魍魉横行的复杂社会中经历过来，要保全名节也是不容易的。

1945年8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春先生和同住在

霞飞坊的夏丏尊先生对胜利带来的喜悦和希望，也兴奋了一阵子。但不久，喜悦和希望也就成了泡影。胜利后，许多旅沪学校都返回原地复校，机构的变动，一时青黄不接，他便又失业了。为了糊口，他只好到立达国际贸易公司去当名小职员。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时局动荡，在春先生在上海所见到的“抗战英雄”，都是些天上掉下来的（重庆乘飞机来沪接收敌产）、地下冒出来的（汉奸摇身一变）接收大员，一个个都由穷光蛋一下成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位子、女子）大发胜利财的富翁。黄浦江里日本膏药旗战船换成了美国的星条旗兵舰，马路上到处有横冲直撞的美国军用吉普车，吃得醉醺醺的美国士兵在追逐中国妇女，大街上满目都是推销美国剩余物资的地摊，这都与在春先生想象中的胜利景象别如天壤。为此他深感失望，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九、斥丑恶现象

国民党“接收大员”，老百姓称为“劫收大员”，到处乱扣“敌产”帽子，巧取豪夺，大失民心。美国人代替日本人，只是虎去狼来，人民无不痛恨。终日钻在书本之中，书生气十足的在春先生一类知识分子，看不下去，大失所望，心中有话无处诉说。这时他经赵景深教授介绍到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修辞课。1945年底，友人吴天（电影导演）约在春先生和吴琛（著名越剧编导）一起创办《文章》月刊，于先生欣然同意，随即投入筹备，于1946年2月创刊号出版。他们的目的是以严肃的编辑态度，正当的思想内容，来冲击黄色刊物，抢占舆论阵地。月刊中较详地报导了解放区的蓬勃生气，对国统区的丑恶行为作了客观的扫描。在春先生感到月刊代他说

了心里话，对这工作甚为愉快。但上海反动当局容不得别人揭他的疮疤，《文章》仅办了四期，就被停止刊出。

未久，在春先生在内表弟赵寿昌的鼓动下和内弟张骏祥（上海电影界著名人士）合办《水准》文艺周刊。经短期紧张筹备，于1947年3月创刊号出版。周刊撰稿作家都是沪上一时之选，其中有袁水拍、臧克家、魏金枝、朱光潜、黄佐临、安娥等。文章既有文彩，又有思想性，对时弊不免也有托物起兴，借景抒发之处，这又为反动当局大忌，仅办了三期又被迫停刊。

在春先生两度创办政治色彩还不算浓的刊物，虽为时较短，但他孜孜以求的工作精神，反映了一个处在中间状态知识分子的抱负和意向，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十、乱世中求生

随着时局动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国民党的法币与汪伪的储备券同样混乱不堪。为了维持一家生计，在春先生只能继续任教，在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修辞学。此外，还兼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文系教授，同时又兼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讲授国文课程。为了弥补物价上涨，只得多兼点钟点，疲于奔命来维持生活。在旧社会百物飞涨的年代里，一个清苦的穷教师不同时兼几个学校的一些钟点（即授课时间）是无法养活一家老小的。大学教授兼中学、甚至兼授夜校的课程，在那时是司空见惯的，在春先生也不例外。

在春先生自1932年从事国文教学，不断勤奋研究，发表文章、创办刊物，阐发主张，颇有创见，在文教界也颇有影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重新挑起内战，在这动荡的局面